

林孝庭 ○ 著

# 困守与反攻

冷战中的台湾选择

·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沈志华推荐  
·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亚洲馆藏部主任著作  
· 从海外解密档案中解读冷战与台湾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林孝庭○著

# 困守与反攻

冷战中的台湾选择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 / 林孝庭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108-4237-5

I. ①困… II. ①林… III. ①台湾省-地方史 IV.

①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6394 号

## 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

- 
- |      |                           |
|------|---------------------------|
| 作 者  | 林孝庭 著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 68992190/3/5/6      |
| 网 址  | www.jiuzhoupress.com      |
| 电子信箱 | jiuzhou@jiuzhoupress.com  |
| 印 刷  |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20                        |
| 字 数  | 307 千字                    |
|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08-4237-5    |
| 定 价  | 58.00 元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序 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正式宣告结束，然而世界大战的乌云才刚刚散去，美国与苏联两大超级强权，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大幕，又从战后的砖瓦废墟上，缓缓拉起。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于首都华府国会山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发表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谈话，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关于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决定以大笔经援，用来帮助希、土两国政府压制其境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也标志着美、苏之间“冷战”的开始。此后四十余年间，全球几被一分为二，以美、苏两强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情报、科技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里，不断上演着一出又一出对峙与对抗的戏码，由于美、苏两强各自拥有大量核武器，此一长达近半世纪的冷战对立格局，也让国际社会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柏林危机、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与中东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一次又一次引发世人极大的关注与恐惧，担忧这些冲突将导致核战争，最终摧毁整个人类文明。

1950年6月间所爆发的朝鲜战争，可说是二次世界战后国际冷战对抗格局形成之后，全球所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并未如预期般出现在当时美、苏两强最主要争执焦点所在地欧洲大陆，而是发生在亚太地区的朝鲜半岛，在一块直到1950年初都未曾被美

国官方正式纳入其亚太防御线内的分裂国家领土之上，着实令当代许多治史者感到意外，而此一意外发展，也注定要让 1949 年 12 月间，退守台湾一隅的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因美国随后参加朝鲜战事以及其对亚太地区地缘战略政治考量等因素，而在此后数十年的亚洲区域冷战场上，扮演着一定之角色。无可讳言，从更宽广的历史格局观之，1949 年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峙与海峡两岸关系史，亦是全球冷战对抗架构下，不可被忽视的一环，20 世纪 50 年代所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至今仍是吾人研究亚洲冷战史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案例，然而遗憾的是，除了这两次外岛危机之外，整个冷战时期蒋介石与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当局究竟曾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台湾在亚洲区域冷战战场上的历史定位如何，在当今中外学术界里，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本书所收录的十个章节，是作者过去十余年来，在华府、伦敦、台北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等地收集、爬梳、整理、研读、分析与消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后，所积累的一个初步结果。撰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即在于回答如上问题：除了审思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起，蒋介石与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当局，在亚洲冷战战场上所处之角色与地位，同时还尝试着对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经验，进行全面观照、陈述与诠释。诚然，在吾人过去普遍认知里，1949 年以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亚洲冷战战场上所面临的最主要压力与竞争对手，是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直到蒋介石 1975 年撒手人寰为止，在迁台以后 20 余年中，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当局，依恃着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防承诺与“外交”上的支持，在各个领域里，与北京之间进行着似乎永无止息的对抗，此一态势，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主政后，逐步改变对华政策，才出现结构性转变。

然而如同本书各章节内容所即将呈现的，冷战时期台湾在亚洲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与海峡两岸互动关系，实远比吾人过去所认知的，要来得更加诡谲复杂；随着中外官方解密档案的大量开放，吾人如今可以知悉，亚洲冷战场上的蒋介石，绝非仅只扮演着由美国所领导之“自由世界”阵营里，一个唯华府是从的马前卒，凡事仰仗美国鼻息，以华府为马

首是瞻。相反地，国民党当局为了台湾自身战略生存与安全利益考量，在中南半岛与其他东南亚各地区，曾广泛且积极地介入各地的军事冲突，设法输出其自身“反共”经验与意识形态，以确保并强化其在国际地位与台湾内部政权统治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回顾历史，国民党当局在海峡两岸以外其他亚洲冷战场上的作为，有些是配合美国政府的整体亚洲策略而行事，然而其中更有不少行动，乃是蒋介石甘冒惹恼华府决策者之风险，不惜与美国“老大哥”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国共与两岸关系，也绝非如过去吾人所认知的，双方敌我意识分明，毫无往来，如同本书所即将揭示的，在某些重大议题上，譬如西藏问题，台北与北京所持立场，远比台北与华府等西方国家阵营之间态度，要来得更加接近，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也屡屡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保持着一定之秘密联系管道。冷战时期国共双方此类接触，往往不为美国所喜，华府情报与外交当局，甚至向台北横加阻挠施压，而蒋介石则试图利用这些两岸秘密接触，反向操作，设法转化成为台湾向美国争取更多资源之筹码，尤其甚者，冷战时期的两岸密使往来，还牵连着当时国民党内部微妙的权力竞争关系。读者在“台湾秘密研发核武”此一篇章里也将清楚观察到，美国如何在高度现实利害考量下，以最严厉的立场与手段，来对待其在亚洲、乃至全球冷战战场上最坚强的盟方之一台湾。本书各章节所将呈现者，可谓“历史平台上的裂缝”：在看似平滑无缝的历史平台表面下，实存在着无数细微的裂痕，有待吾人加以检视、细查、发掘与观照，让历史事实与真相，能够更加清楚地被呈现出来。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各章节所利用的第一手史料，主要来自于美、英与台湾方面的解密档案，而基于这些史料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与论述，无可避免地也将较多地呈现出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与美国的立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亚洲冷战战场上美国与大陆、台湾三方关系的竞逐互动，台湾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角色，任何缺少来自台湾与国民党方面的观点与其角色扮演之探讨，则整个亚洲冷战史的研究都将无法圆满。从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的视野来解释与观察其在亚洲冷战战场上的定位，据此填补近代史研究上的一片空白，也许将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贡献所在。

本书各章节的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海内外师长与同道的协助、批评、指正、讨论与建议，作者要致上最真诚的谢意与敬意，为避免挂一漏万，恕本人不在此一一列名。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同仁，过去数年来对于本人的学术研究与档案行政工作，给予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借此书出版之机，本人要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之意。美国华府国家档案馆、华府国家安全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等机构的相关服务人员，过去十余年来对于本人查阅档案所惠予之的热忱服务，在此也一并由衷致谢。北京九州出版社对于本书出版计划的热列支持，以及全体同仁对书稿所提供之最专业服务，同样令本人深感敬佩。

最后，作者要特别向养育栽培我的父母亲林文辉、郭佩华，以及坚定支持我走向学术研究之路、不惜放弃其原本优渥工作待遇的妻子徐海蕾，表达我最深的爱意、敬意与感谢，没有他们的辛劳、鼓励、体谅与牺牲，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

林孝庭

2016年12月于胡佛研究所

## 目 录

|                                 |      |
|---------------------------------|------|
| 序言 .....                        | (1)  |
| 第一章 冷战边缘：美国与冷战初期的中国边疆 .....     | (1)  |
| 1947 年北塔山事件与美国在新疆的秘密活动 .....    | (2)  |
| 冷战初期美国对中国内陆边疆的战略思维 .....        | (6)  |
| 国共内战下的美国援助中国西北方案 .....          | (11) |
| 美国与马步芳主持下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        | (15) |
| 西北地区情势逆转与美国未曾被实现的秘密行动 .....     | (19) |
| 第二章 蒋介石与朝鲜战争关系探源 .....          | (27) |
| 中国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溯源 .....              | (28) |
| 对日抗战与蒋介石的朝鲜政策 .....             | (31) |
| 抗战胜利前后的中朝关系——表象与现实 .....        | (37) |
| 战后的蒋介石与对韩政策 .....               | (41) |
| 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与冷战 .....              | (44) |
| 第三章 冷战初期的“第三势力”与台湾的“敌后工作” ..... | (52) |
| 台湾的“敌后工作”请缨热潮 .....             | (53) |
| 毛森与他的“敌后游击”工作 .....             | (58) |
| 美国与亚洲的“第三势力” .....              | (63) |
| 华府地区的“敌后反攻”热潮与美国对台政策 .....      | (67) |
| 昙花一现的台美“敌后反攻”——李弥与滇缅游击队 .....   | (75) |

|                                |       |
|--------------------------------|-------|
| 第四章 第一次台海危机、“白团”与台、美军事关系 ..... | (82)  |
| “和”与“战”之间的徘徊 .....             | (84)  |
| “白团”：蒋介石“以日制美”的尝试 .....        | (87)  |
| “双胞胎”计划 .....                  | (92)  |
| 1954 年外岛危机与台、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 .....  | (98)  |
| 谈判过程与缔约意义 .....                | (103) |
| 第五章 蒋介石与 1962 年台海危机 .....      | (108) |
| 肯尼迪总统对华政策新思维 .....             | (109) |
| 台湾岛内与中国大陆的微妙政治发展 .....         | (113) |
| “国光计划”与具体决策 .....              | (118) |
| 政治与外交层面的准备 .....               | (122) |
| “国光计划”之推迟与决策转折经过 .....         | (125) |
| 国民党“挽回颜面”之举 .....              | (130) |
| 第六章 冷战与两岸密使 .....              | (134) |
| 万隆会议前后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策略 .....       | (135) |
| 曹聚仁角色再探究 .....                 | (138) |
| 1958 年台海危机与两岸秘密接触 .....        | (143) |
| 两岸密使与蒋氏父子、陈诚之间权斗 .....         | (150) |
| 1962 年台海危机前后的两岸秘密接触 .....      | (153) |
| 1963 年以后的与两岸秘密接触 .....         | (156) |
| 第七章 冷战与西藏问题 .....              | (161) |
| 西藏问题的“内政化”与“国际化” .....         | (163) |
| 台美双方培植西藏“代理人”与秘密管道之建立 .....    | (166) |
| “拉萨暴动”前夕台美之间的西藏议题 .....        | (170) |
| “拉萨暴动”与台美之间的政策歧异 .....         | (178) |
| 西藏议题与台美之间的“冷战外交” .....         | (183) |
| 台美同盟关系下的裂缝 .....               | (190) |

|                              |       |
|------------------------------|-------|
| <b>第八章 冷战与台湾、印度之间的“密使外交”</b> | (194) |
| 中印边界战争与印度拉拢台湾                | (195) |
| 台印间“非正式外交”接触经纬               | (199) |
| 高调“密使”惹尘埃                    | (204) |
| 台北、香港与新德里：台印“外交”折冲内幕         | (207) |
| 美国的支持与印度驻港官员的阻挠              | (211) |
| 台印关系胎死腹中                     | (214) |
| <b>第九章 冷战与台湾在东南亚各国的秘密活动</b>  | (219) |
| 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的相遇：滇缅游击队           | (219) |
| 台湾的“国家安全”与“反共”输出             | (222) |
| 国民党在东南亚的秘密冷战：缅甸与老挝           | (230) |
| 唇齿相依般的台湾、南越关系                | (238) |
| 冷战、越战与国共内战                   | (242) |
| 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蒋介石与亚洲冷战          | (246) |
| <b>第十章 台湾研发核武秘辛</b>          | (255) |
| 中共发展核武与台、美反应                 | (256) |
| 中共核试爆成功与台北高层的心理折冲            | (262) |
| 鸭子划水的“核能外交”                  | (266) |
| 70年代“研究用途”的核武计划              | (272) |
| 台美脆弱关系下的核武研发争议               | (279) |
| 台美“断交”前夕的“核外交”风暴             | (284) |
| 余波荡漾                         | (289) |
| <b>结语</b>                    | (292) |
| <b>征引书目</b>                  | (298) |

## 第一章 冷战边缘：美国与冷战初期的中国边疆

1947年夏，美国总统杜鲁门继该年3月于华府国会山庄发表著名的国情咨文、开启“杜鲁门主义”之先声后，又进一步宣布美国将推动“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准备投入庞大经济与财政资源，协助重建二次战后欧洲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对抗该地区以苏联为首共产主义力量的兴起，这也让东西方间的冷战对抗，于二次战后的欧洲大陆上迅速升温。而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亚洲大陆上，国际间冷战对峙的逐步成形与战后中国国内的政局发展，亦有着密不可分的纠葛，无可讳言，美、苏两大强权在亚洲地区的冷战，是围绕着中国以及其周边地区展开的，冷战不仅对二次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也让中国的周边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全球冷战中“热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从一个大的历史脉络来看，1946至1949年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军事对抗，严格而论，与美、苏两强在世界各地操纵“代理人”进行相互对抗的冷战“标准”模式，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谈。有趣的是，论及二次战后冷战在中国的源起，当吾人仍主要聚焦于国共内战之际，其实当时距离中央政治权力中心遥远的广大西部边疆地区，却早于中国内地省份，首先笼罩在全球冷战的阴影之下了；抗日战争结束后西部中国边陲地带的政治、军事与涉外情况，不论是从“国共对抗”或是美、苏两大强权在亚洲冷战战场上竞逐的角度观之，皆值得进一步观察。一说1949年由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击溃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导致美国随后加速推动对中国大陆的围堵策略，从而

开启亚洲地区的冷战赛局，但早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于1949年出现决定性结果之前的数年间，“冷战”似乎即已在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悄然展开。

本章利用解密的中英文档案，揭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位于中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诸多军事与外交谜团，包括美国如何在新疆、内蒙古与西藏地区，进行所谓的“反共”冷战秘密布局，其秘密行动的具体内容为何，以及这些行动最后如何以失败收场。借由对这些过去鲜为人知历史事件的介绍与回顾，相信对于今日吾人重新思索二次战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以及冷战如何从中国边陲地带开始逐步形成，当有所助益。

### 1947年北塔山事件与美国在新疆的秘密活动

自清王朝崩解以来，民国中央政治力量未能真正有效深入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在外蒙古与西藏，部分地区的蒙、藏政教领袖，拒绝接受民国新政府所提出的“五族共和”论述，并分别转而向俄国与英（印）交好，以寻求建立其政治与经济地位。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精英，首先倾向于有条件与民国新政府合作，以换取来自后者更多的政、经资源，然而一部分内蒙古王公上层人士，如德穆楚克栋普鲁（德王）、云端旺楚克（云王）、李守信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转而在体制外寻求与日本合作，以推动内蒙古“自治”为名，准备在政治上脱离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但仍有另一部分内蒙领导人物如沙克都尔札布（沙王）、达理札雅（达王）等，在国民政府的优厚条件礼遇下，继续奉中华民国为正朔，并在传统的蒙古盟旗制度下维持世袭统治。<sup>①</sup>

自清末以来，青海、宁夏与甘肃等省份就由当地的回族马氏家族所主导，民国成立后，马氏家族承认历任中央政府正统，仍保持其在西北势力

① 有关民国初年外蒙古问题之研究，参见：张启雄，《外蒙古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刘学铤，《外蒙古问题》（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有关民国初年西藏问题之研究，参见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年）。有关1930年代内蒙古自治运动之研究，参见阎天灵，《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北京），2001年第1期，页46—57。

范围内的独特地位，而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国民政府中央在这些地区的政令与影响力，依然极为薄弱。类似的情形亦发生在光绪初年即已建省的新疆地区，民国成立后，该省政局就由清末以来被派驻在当地的一批汉、满族军事与行政官僚所主导，并且维持着政治、军事与外交皆高度自主的状态，从 1911 年到 1944 年，新疆省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与盛世才的统治，并且与历任民国中央政府，保持着“认庙不认神”、若即若离的关系。<sup>①</sup>

从更宽广的地缘政治角度观之，1937 年起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促使整个中国中央政治势力与重心，从内地省份向西部地区推进，而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到四川重庆之后，也因地利之便，开始有机会将其在对日抗战之前原本的薄弱政令与影响力，逐渐打入中国西南与西北边陲。国府力量在战时逐步延伸至中国大西部地区，有许多迹象可寻，譬如 1941 年之际，重庆国府已可排除万难，将效忠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安排进驻于西蒙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与甘肃河西走廊等战略要地，并且在这些原本由当地军政势力牢固控制的地区，直接征税与派遣官员。<sup>②</sup> 1941 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后，中、美、英、苏组成同盟国，国民政府利用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借由开办中亚国际驿运公路线的机会，进一步把军事、党政与财经力量推进了新疆省；1944 年秋，统治新疆省长达十余年的盛世才被撤换，由

① 有关民国时期马氏家族势力在西北之研究，参见：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年）。有关民国时期的新疆省，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年）；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战时国民政府的党、军、财政势力在中国西部内陆快速增长，普遍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外交与军事人员的关注，咸认为这是国民政府于 1928 年建立以来，一项重要的成就。见：WO 208/268, Memorandum by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Chief of Censor,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22, 1942; Report from the Office of Military Attaché of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War Office, November 12, 1942; FO 436/16605 F6275/254/10, Report on Sir Eric Teichman's journey to Sinkiang, enclosed in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24, 1943; NARA, RG 59, 761.93/1725, O. E. Clubb (U. S. Consul at Tihwa) to George Atcheson (U. S. Chargé in China), June 5, 1943.

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吴忠信接任省主席，自1912年清帝国结束以来，中国的中央政府首次得以直接治理此一广大西部省份。<sup>①</sup>

二次大战时期国民政府影响力推进新疆，也让美英等同盟国家的外交势力，得以延伸并进入中国西北地区。1943年，英美两国同时获准在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并与重庆国民政府派驻在该省的外交人员，共同处理战时同盟国驿运业务，而两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亦获准得以进出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省份，进行实地考察旅行，广大的西部内陆省份自此不再成为西方驻华外交官眼中的神秘“禁区”。甫进驻迪化的美国外交领事人员，也开始注意到国府与苏联之间在该地区逐渐加剧的摩擦。整体而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后，美国对于中国西部边疆事务的关注，大部分仍是“功能性”，亦即在于评估并协助国民政府打通中亚，将当时囤积于印度与伊朗的同盟国物资，由中亚经由新疆运往甘肃与中国西南地区，以支援蒋介石对日抗战，同时则避免直接介入中苏两国间因新疆问题而产生的争议。然而美国对于中国边疆事务的被动与谨慎态度，在战后却有了大幅度的转变，发生于1947年夏天的“北塔山事件”，则是此一政策转变的催化剂。

1947年6月初，当时已获得法理独立地位的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队，向国府驻守在新疆省奇台县以北，新、蒙边界的北塔山边防部队，发动猛烈进攻。根据国府方面的指控，6月5日至9日接连五天，外蒙古战斗机持续轰炸新蒙边界，驻守当地的国军部队亦回击，双方互有伤亡。另一方面，外蒙古政府则坚称北塔山为其国土之一部分，并指控由哈萨克族领袖乌斯满所领导的中国部队，已“违法”越界驻守。<sup>②</sup>对此，当时已自重庆迁回南京的国民政府，虽无法在第一时间内搞清楚整个边界冲突的真实面貌，然而远在内地的中央政府官员，却一口咬定此事件乃苏联背后

①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页361—375；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页77—79。

② 参见：“蒙藏委员会致外交部函”（1947年6月17日）；“外交部亚西司签呈”（1947年6月27日）；“内蒙古额济纳旧土扈特旗九年计划与国防计划秘密报告书”，附于“行政院致外交部”（1947年8月17日），《苏联与外蒙对内蒙之阴谋案》，《“外交部”档案》，档号112/93。

指使，目的在于结合“三区”反政府势力，欲将国府的势力逐出新疆。<sup>①</sup>当时国际舆论亦传闻蒋介石意在扩大渲染此次边境冲突的严重性，以争取国际间、特别是美国，对南京更多的支持，同时转移中国内地舆论对于日益加剧的国共冲突之注意力。<sup>②</sup>

不论如何，新疆政局在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开始急遽恶化，是个不争的事实；稍早之前，1946年5月间，当时奉命代表国府与伊犁当局谈判的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与“三区”代表达成停火协议，组成一新疆省联合政府，由张本人担任省主席，并延揽“三区”独立运动领袖如阿合买提江、赛福鼎等人进入联合政府。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为了掌握北塔山事件的来龙去脉，立即指示时任美驻迪化副领事、实为中央情报局干员的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迅速前往新蒙交界实地了解情况。在北塔山区里，马克南见到了乌斯满本人，得知他本是1944年伊犁“三区”政权所委派的驻阿山地区行政专员，并获得苏联方面的背后支持，据乌斯满密告马克南，1944年秋，盛世才被蒋



马克南在新疆

介石调离迪化后，莫斯科方面曾秘密向他提供大批武器，补充其所领导的哈萨克游击队，希望利用他将汉人势力完全逐出阿山地区，然而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人开始在当地哈萨克族游牧区大举开采矿物，此行动遭到乌斯满与游牧当地的哈萨克族人极力反对，苏联人因而决定改支持乌斯满的对手、同为哈萨克族的达列力汗，来领导阿山地区的哈萨克部落，此举让

① “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电呈蒋委员长北塔山事件背景及详细经过”（1947年6月15日），《外蒙军及苏机越界侵新疆案》，《“外交部”档案》，档号112/923；FO 371/66443 N7102/4303/38，“Report of Mongolian Penetr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June 16, 1947；FO 371/66443 N7114/4303/38，British Foreign Office minute paper，June 17，1947。

② FO 405/17912 F4378/4378/10，“China: Annual Report for 1947,” enclosed in Ralph Stevenson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to Foreign Office, March 5, 1948.

乌斯满决心投靠国民政府。因此自1946年夏天起，乌斯满开始与张治中、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等国府重要军政人员秘密接触，并获得国府方面的一些军火物资援助，1947年3月起，乌斯满率领游击队开始在阿山地区与苏联所支持的“三区”民族军交战，但寡不敌众，最后节节败退，一路撤退至新、蒙边境的北塔山。<sup>①</sup>在与马克南的谈话中，乌斯满希望美国能够向他提供军事援助，以利其在北疆地区继续对抗苏联，而根据马克南向华府所呈之机密文件显示，在他离开北塔山返回迪化前夕，乌斯满交给他一些苏联人在当地开采的矿物标本，这些矿物随后被马克南带回迪化做初步的化验分析，美方坚信，苏联在阿山地区急于开采的矿物，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制造原子弹所不可或缺的铀矿，苏联方面极有可能为了取得这些珍贵铀矿，才会再次鼓动伊犁“三区”进行反政府暴动，使北疆地区进一步脱离国民政府的有效控制。<sup>②</sup>

### 冷战初期美国对中国内陆边疆的战略思维

美国驻迪化领事馆有关北塔山事件的第一手调查报告，立即引起美国国务院与军方极大关注。1947年下半年以后，美苏之间在欧洲大陆的对抗日趋严重，冷战的序曲俨然已经展开，就华府而言，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战略布局最紧要的任务之一，即在于阻止或者延缓苏联取得制造原子弹之技术与原料。苏联在北疆地区积极开采稀有矿物的举动，以及当时有关斯大林（Joseph Stalin）即将在俄属中亚秘密进行原子弹试爆的传闻，皆让美国官方体认到必须尽速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1947年11月，美国空军总部依据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建议，派了一组军方人员经南京飞往北疆，进行一项代号为AFOAT-1（Air Forc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Atomic Energy Office, Section One）的秘密考察行动，随后不久，美国军方

① NARA, RG 59, 893.6359/6-3047, Memorandum entitled “Peitaishan Incident Report,” prepared by Douglas Mackiernan, June 30, 1947.

② NARA, RG 59, 893.6359/8-2947, U. S. Consulate (Tihwa) to State Department, August 29, 1947.

即决定以驻迪化领事馆为掩护，于该地设立一侦测苏联原子试爆活动的观察站，名义上由空军的赫根柏格少将（Major General Albert F. Hegenberger）来主持，并由马克南进行实际运作，美方同时也决定透过其驻迪化领事馆，暗中给予乌斯满的哈萨克族游击队新的武器援助，以利其继续监控与骚扰苏联在阿山地区的活动。<sup>①</sup> 巧合的是，美方于1947年年底决定秘密援助乌斯满之后，其所领导的哈萨克游击队随即于1948年年初，扭转原本的劣势，顺利反攻并占领北塔山与部分阿山地区，并且一度引来外蒙古政府对南京当局的严重抗议。<sup>②</sup>

美国在1947—1948年之际对北疆地区的积极关注，除了出于监视与围堵苏联在中亚活动的战略考量之外，也相当程度地反映出当时华府对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政治与外交思维。随着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逐渐走下坡，美国外交与军方人员自1948年年初起，即对中国政局未来的可能走向，提出研判。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大使为首的驻南京大使馆官员，普遍认为国共内战一旦长久持续下去，中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甚至有可能回到民国初年各地强人割据一方、“地方主义”盛行的混乱局面。美驻华大使馆因而向国务院强烈建议，应及早因应中国内部再度四分五裂的可能性，并且提出具体有效的对策，让未来中国各地可能出现的“区域性政权”，能够有力量继续对抗共产主义，使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继续保持不坠。<sup>③</sup>

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同样注意到国共内战已让蒋介石领导的国府，对中国各边疆地区的控制力急速下降，然而与国务院的观察较为不同的是，美

① NARA, RG 341, Records of Headquarters U. S. Air Force, Air Force Plans, Project Decimal File 1942 - 1954, Box 736, "Report of Airfield Inspection in Northwest China," prepared by Colonel William D. Hopson of the Air Division Army Advisory Group, Nanking, China, dated February 2, 1948.

② “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致外交部长王世杰电”（1948年3月2日）；“外交部驻新疆省特派员刘泽荣致外交部电”（1948年3月2日），《蒙军侵新案》，《“外交部”档案》，档号112/93；FO 371/69631 F3506/2538/10, British Embassy in Moscow to Foreign Office, February 27, 1948；WO 208/4718, Office of Military and Air Attaché,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War Office, September 29, 1948.

③ NARA, RG 59, 893.00/3 - 448, John Leighton Stuart (American Ambassador to China) to State Department, March 4, 1948；893.00/3 - 848, Stuart to State Department, March 8, 1948.